

历尽坎坷见真情

——我的父亲李宗津和母亲周珊凤

○李之清

1940年1月，我的父亲李宗津经兄李宗恩（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也是贵阳清华中学的董事）的介绍，到贵阳私立清华中学任教。清华中学是由我的外公周诒春和一些清华大学毕业的抗日青年创办的。1942年9月，我的母亲周珊凤也从敌占区辗转来到清华中学。据贵阳清华中学学生陈扬铨的回忆：“李宗津和周珊凤老师相识不久就堕入爱河，经常看见他俩在公园河边散步谈天，1943年我念高三时，他们在花溪边的‘小憩’举行了婚礼……”

李宗津1916年10月24日出生在苏州。从我父亲懂事起，家庭的经济情况已不太好。在他11岁那年（1927）我爷爷就病故了。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李宗恩把后母、四弟李宗瀛、五弟李宗津、小妹李宗蕻接到了北平。1927—1934年间，我父亲毕业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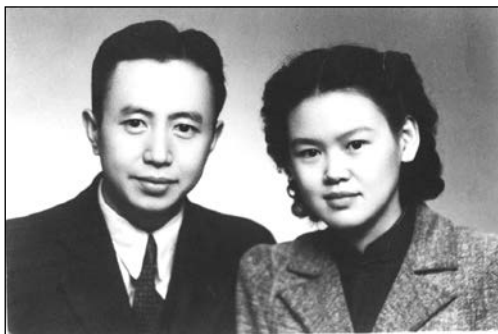
1943年李宗津和周珊凤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

平私立育英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绘画的热爱，违背兄长的意愿南下就读于苏州美专，从此走上了从艺的道路。

母亲周珊凤1916年4月12日生在上海。1935年读高二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校长 Alice Moore 推荐参加考试，竞争美国举世闻名的布尔茅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为中国女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每隔四年1名），获得成功。1935年10月开始，她以 May Chou 的名字赴美国学习，成为该校首位东方女性学生，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为日后亚洲女生进入这所洞天府开创了先例。回国后，她先后在东吴大学和东吴附中教授英语。1942年她和弟弟，即我的四舅周耀康结伴，辗转到达大后方的贵阳。

我的姑姑李宗蕻曾回忆说：“你父母交朋友的时候，周老伯（外公周诒春）曾对你母亲说：你找一个搞艺术的，虚无飘渺的，小心以后吃不上饭。但在你母亲结婚时，周老伯还是为她举办了婚礼。当时婚礼的女傧相是我，男傧相是清华中学的老师梁庆煜。我的小哥李宗津为婚礼还专门做了一套灰色的再生布中山装。不过我的嫂子不喜欢应酬，她觉得这种仪式太没意思了。”我弟弟曾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会嫁给同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父亲，母亲说，因为她觉得父亲是个好人。在花溪时，我外公有个朋友叫虞振镛，虞的大女儿和我的四伯父李宗瀛是一对恋

□ 名师轶事



青年李宗津和夫人周珊凤

人，所以我父亲有时也去虞家蹭饭。他一进门就会问，有没有我的饭？虞家几个比父亲还小的女孩子就会拿他开心：没你的饭，没你的饭。父亲从来也不会生气。他是一个乐观、单纯、热情、坦诚，对人从不设防的人。用我姑姑的话说：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我的父亲1945年初至1946年到北平前，都是以卖画为生。母亲的老朋友胡世平先生告诉我，1946年，在北平美国学校校友聚会的时候，他听见我的父亲对别人说：你们谁认识需要画像的有钱人，请介绍给我啊！说明当时我父母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紧的。父母成长的家庭环境不同，从事的专业也完全不同。各干各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上交流。父亲是画家，对音乐也很喜爱，他曾告诉过我，他的嗓子很好，可惜耳朵音准不好，否则他就会去学声乐。电影学院美术系资料室的孙鹰老师曾对我说过，60年代初他们入学时，父亲在给她们上的第一节课上，唱了一首《老人河》，让她至今不忘。可是，母亲并不懂画，也不喜欢听音乐。5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我和父亲常会听音乐节目。父亲笑着说，收音机对母亲的作用就是听天气预报。而母亲一生的事业就是做了一

个非常优秀、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英语老师。父亲很早就告诉过我，母亲是语音专家。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学校请了周珊凤阿姨来给我们讲有关英文语音的要领。那是在搬离中关园后首次与周珊凤阿姨重逢。十几年未见，周珊凤阿姨已是两鬓如霜，但仍旧优雅从容，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她的良好教养，大家风范。她主讲的那堂课给北外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连在座的外籍教师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性格上看，父亲是个外向、热情、很感性的人。母亲则是外冷内热，十分理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爱国、敬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这和他们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亲是由大伯李宗恩（1947—1957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裔院长。毕业于英国哥拉斯格大学、伦敦大学，热带病专家）供他上学的。大伯常教育父亲“人应当自立，应当努力工作”，“作一番事业”，“做事要负责”等。父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四哥李宗瀛（“一二·九”时参加了共产党，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他让父亲了解到共产党是要而且能救中国的。

我的外公周诒春对子女教育更为严格，让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出国深造，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要爱国、敬业。1914年月10月30日，时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在美演讲时说：“诸君毕业，可归即亟归，勿久留此。需知中国需才急也……”他又言留美归国学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身价，二曰不切实用（Fall 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外公认为：“择业不当

贪货利、骛虚名，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造福于人类为准绳。”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后代。所以母亲虽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却一生俭朴。我外公曾给了她一些股票，母亲觉得那些钱不是自己的，为了纪念外公，1991年，她把那笔钱捐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周诒春青年教师奖”，后来又以薛兴怡（我的四舅妈）的名字再次捐款。

1957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四级降为七级。我和弟弟也成了孩子们中的“另类”。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每月的工资比过去低了很多。以后我们都要注意节俭啊！“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分子”，深受皮肉之苦。“文革”后期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但我觉得，正当他处于创作高峰、艺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利；又因为病魔来袭，过早地离开了他最钟爱的绘画事业，这才是最让父亲心痛的事情。所以他在经历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磨难后，仍然积极从事教学，从事创作。后来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制作教学挂图，以极其负责的精神，教育那些从未受过绘画训练、被派到文艺界“掺沙子”的解放军战士。即使是在身患癌症后，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1975年，他曾给我来信说，他想到新疆来看我。但后来手术后的伤口处发生溃疡，并形成一个经久不愈的窦道，需每天换药，还会时时疼痛，不能来新疆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重新画《强夺泸定桥》，因为画特别大，我们的家又小，画挂在家的一面墙上，他站在梯子上作画，

我的弟妹就在下面帮他洗笔。

我的母亲对人很宽容，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我曾经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妈妈想把在山西插队的弟弟调回北京，因为父母身边没有子女，家里换煤气罐等重活都没有人干。当时海淀安置办的人说：“你不够条件，因为你的老伴还在，除非他死了或是瘫了。”不知怎么有个老师硬说这话是母亲说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并在会上揭发。后来在恢复教学再排课的时候，把我母亲和这个老师编在一个小组里。有的同事出于好心，提出让系里不要把她们排在一起，以免不愉快。我母亲得知此事，对这个同事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可以不喜欢×××，但是可以和他在一起工作。”

母亲同事的女儿吴桐曾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周珊凤阿姨的夫婿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先生。李先生1957年不幸被扣上‘右派’棘冠，打入另册。对于这对满腔热血的爱国伉俪来说，这无疑是一致命的一击。李先生的艺术天赋自此被埋没，后来过早辞世。然而周珊凤阿姨并



周珊凤和孩子们在清华大学新林院，左为作者李之清

□ 名师轶事

未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仍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执教,用自己的锦绣才华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而我爸爸的遗言是:“‘四人帮’揪出后,引起很大的兴奋,兴奋化为全国跃进的力量,但我在兴奋后,只能空谈,不能工作,作出任何贡献,对我性格来讲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他发自内心,对自己再不能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绘画事业深深的遗憾。

在生活中,母亲是个心细、整洁、低调、做事有条理的人。父亲就比较邋遢、随意。母亲常会唠叨父亲,比如抽烟、烟灰乱撒到地上,不拘小节,喜欢高谈阔论等等。1976年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我的女儿4岁,童言无忌:“姥姥老是说姥爷,可是姥姥总是不停地干活。”我的父亲脾气好,在和我母亲共同生活的34年中,父亲凡事都让着母亲,他理解母亲为这个家的付出。父亲1946年到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工作,1947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后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回到中央美院上班。因我们家住在西郊,他只能住在美院的宿舍里,每周才回家一次。有时他出去采风,比如去广西桂

平的金田起义遗址,去四川泸定桥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在家。弟弟生于1950年,1952年之后,他得过两次肺炎,还得了支气管哮喘,犯病的时候,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一年有半年都不能上学。母亲除了教书外,照顾弟弟也是非常辛苦的。1957年“反右”之后,父亲又去双桥农场劳动改造,两周才能回一次家,母亲的担子就更重了。1964年,母亲去北京门头沟斋堂,父亲去山西阳高县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成了“黑帮分子”,挨批斗,甚至下跪。1972年,父亲工作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位于北京昌平区朱辛庄,他还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对我说:你爸爸什么活都会干,可惜就是常不在家。他看到我用大拖把拖地很吃力,还特地为我扎了一个小拖把。父亲有一手好厨艺,1976年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时,他已经作过癌症手术,还下厨煮红豆做豆沙,为我和母亲做我们都爱吃的八宝饭。

父亲很爱我的母亲。50年代,他每周离开北大的家去中央美院上班前,都会去亲亲母亲的脸。可能是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意思吧,母亲总是面无表情。吴桐的文章中曾提到:“现在中国有不少年轻女子喜欢以‘名门淑女’‘大家闺秀’自居,并为此洋洋得意。但她们与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周珊凤阿姨相比,真乃天壤之别,相去何止万里。”母亲生于书香世家,日后又去美国留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教养。她为人善良、谦和;加上天生容貌秀丽、身材姣好,使她的气质更加超凡脱俗。母亲的这种气质一直是让爸爸引以自豪的。记得60年代初的某天,我们全



一九六五年李宗津和夫人周珊凤在北大中关园居所前合影



1957年于北京，周诒春先生和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儿媳林懿铿、儿子周华康、女儿周珊凤、女婿李宗津，前排左起：孙女周琳、夫人胡怡爱、外孙李之林、周诒春、孙子周志春

家去位于五道口的一家西餐厅吃饭。不一会儿，有一对夫妇也进了这家餐厅。男士过来和我的父亲打招呼，他是我父亲在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同事。他对我父亲说：“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位女士步态优雅，着装得体，我和我爱人就跟着进来了，没想到那是您的夫人。”在我母亲80多岁的时候，她穿着多年不穿的旗袍照了几张像。我的女儿去取照片时，照相馆的人问我女儿照片上的是什么人。并对我的女儿说，这个老太太可不得了，气质那么好，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我童年时的朋友曾回忆：“记得1957年之前，你妈妈要陪你爸爸到机场接外国艺术家，她在家试旗袍，问咱们哪件好，记得是一件浅灰色很朴素的旗袍。”我母亲穿旗袍时的姿态是特别漂亮、优雅的。

母亲对父亲的情感则不如父亲那么外露，她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判他的文章。那时

我和弟弟分别是13岁、7岁。当时不少右派分子的配偶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丈夫离了婚，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又遭批斗。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母亲总是以非常镇定的态度来对待家庭的变故。她用她坚定的理性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完整。让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在北大燕东园居住的时候，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把抄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带走了，这个箱子里装着家里准备给我带到新疆的500元钱，父亲就追出去了。红卫兵把他围在中间打了他。爸爸回家后很伤心，妈妈却安慰他要面对现实。1974年，父亲被查出直肠癌并做了大手术，1977年初又确定癌症转移到肝脏，还要做一次手术。那年年初，我带着女儿从新疆坐火车返北京探亲，就带着女儿去人民医院看望父亲。他的精神状态挺好。但他告诉我，大夫原来是准备切除他有癌肿的左肝，肝脏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大手术，而打开腹腔后发现右肝上也有

□ 名师轶事

一个黄豆大的癌块，所以再做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大夫直接在肝脏上打了一支抗癌药就缝合了。因为当时手术用的是局部硬膜外麻醉，大夫说的话父亲都听见了。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我完了。”当时母亲很镇定，反而劝慰父亲，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父亲还对我说过：“你妈妈是一个大事特别清楚、冷静的人。‘文革’中，有一次工宣队让大家相互揭发，满座鸦雀无声。突然你母亲一个人站起来只身退场。她本来是一个谦和、言语不多的人，她的这种行动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文革”中，我为了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把我的一架手风琴和一块手表送交给了电影学院红卫兵组织“井冈山”，还写了一份“揭发”我父亲的材料，提到他在1960年困难时期，曾在“违法”市场买了一只高价羊，在家请美院的右派分子江丰、王逊、洪波、冯法祀、王曼硕等人吃饭的事。而父亲当时已被迫在学院里扫厕所，恰好在纸篓里看见了这份材料。由于父亲一直比较疼爱我，对此事他一点不计较，回家后还笑着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说：你爸爸真可怜，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一样。至今一回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无地自容。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北京探亲。当时直肠癌术后的窦道疤痕折磨着父亲。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三个愿望：一个是想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是尽早把第二稿《强夺泸定桥》画完；第三个愿望是能和母亲朝夕相处。地震之后，我们一直住在院子里，父母就让我们快点回新疆去。因为在住所外面的露台居住，

严重地影响了父亲的休息，所以母亲和弟弟让他去上海姑姑家休养。父亲不愿意去，他对弟弟说：“你很负责任，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感情。”其实是他不放心母亲。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在她每隔几天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她在信里写道：“……几十年来，由于下乡、出差、工作地点远，我和你爸爸常常不在一起生活。但每星期、或隔几个月、最长一年多，他就回家了。我还很难相信这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过去什么事都和他商量，现在我再也得不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了。”我的表弟对我说过，有一次他陪我母亲去八宝山看我父亲的骨灰，当时母亲一定要打开骨灰盒，而且哭得特别伤心。母亲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看到骨灰盒，我有说不出的难过，直到现在我还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每当我去学校看到下垂的柳树枝时，就想到他不再需要我给他剪柳树枝了（为了利尿）。这几天特别热，我都热得难受，我又想，幸亏你爸爸不在了，也可少受好多痛苦。”在我的记忆中，我只看见妈妈哭过一次，就是她在看到我外公去世消息的那封信时。我现在才理解，虽然弟弟、弟媳对母亲很孝顺，但在我父亲去世后29年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母亲是那样孤单，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前些年，我曾去美术馆看了吴作人先生的画展，回家后和母亲谈到我的感受。她说：“北平解放前，我们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吴伯伯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就在我们家包饭。”母亲感慨地说：“你爸爸的命太不好了，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失去了创作的权利。

1977年去世的时候，‘右派分子’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那么多罪。总算是粉碎了‘四人帮’，正是可以好好画画的时候，他又得了这个病，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家里住上了三居室房子，不用像过去在燕东园那样，三家合住在一楼，上厕所还要排队。”但母亲又说：“可是如果你爸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腐败现象，他会特别失望的。”

在陪伴了父亲3个月后，1977年5月9日，我又返回了新疆。5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后的第15天，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山上的剪毛站工作，等我下山看到母亲5月25日的来信时，父亲已走了20多天。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去世后，电影学院、北大西语系和弟弟工作单位的组织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家。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爸爸的骄傲，你要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安心工作。”6月2日的信中又告诉我有哪些亲戚、朋友来了电话，以及父亲追悼会那天的情况。

1977年6月24日母亲给我的信上写道：“爸爸非常希望我给你写信。一次他叫我给你写信，我说早已写了，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他又叫我写，我实在太忙，写了一行半就放下了。你的悲痛我是可以想象的，今后我虽然代替不了爸爸，但我一定努力多关心你。”至今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在父亲去世前15天，我要返回新疆了，父亲、母亲和姑姑送我们出了家门，父亲一直送我到燕东园院子边的台阶前，我下了台阶回头看他，他正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他对我说：你放心走吧，下次你回北京的时候我还会活着。我走到燕东园的门口，

忍不住痛哭起来。门房的大妈安慰我：你别太难过，你爸爸会好起来的。没想这次分别，竟然就是我和父亲的诀别。1977年5月24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带回家中。随着我们家从燕东园迁到了中关村公寓，一直陪伴我们29年。母亲生前多次表示，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1999年，在骨折治疗后刚可以拄着手杖行走时，她就让我陪她一起去海淀公证处做遗体捐献的公证。当时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一行动，态度生硬，按程序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还问母亲：你为什么要捐献遗体？她简短地回答：“为人民服务。”母亲对我说，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多为他人着想。人死了要火化，要让大家来遗体告别，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还要去麻烦领导和同事。捐献了遗体可以为医学做贡献。她还说，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死后的待遇再高，人们也不一定会记住他。相反，想记住你的人是一定不会忘记你的。2006年2月10日19点15分，母亲因病在北医三院住院32小时后永远离开了我们。根据她的遗愿做了遗体捐献。

2006年4月份，北京市红十字会在通县长青园为遗体捐献者建立了墓碑《生命》，遗体捐献人的名字按年份刻在大理石上，环绕着《生命》。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全家人在离《生命》墓碑不远的地方，把在家中存放多年的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遗物（一把梳子、一条纱巾和一个发卡）合葬在了一起，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去扫墓。我们衷心地祝愿父亲、母亲在天堂安宁幸福。